

听听一位学校老师的肺腑之言：

孩子成了烧旺校外补习之“火”的木柴



潘尚理

最近各类社会培训机构又被推上风口浪尖，在媒体报道了疯狂的校外补习后，不少家长无奈地表示：补习班，必须得去，因为“学校该教的不教”“我身边人都带小孩学，我们不学就落后了”“学校缺位，社会培训机构当然就要入场”……

作为一名有10余年教龄的老师，一直以来，和家大打交道时内心都非常纠结。同一事件，老师和家长的视角不同，结论也不同。在我看来，这些补习班的火，很大程度上是家长对补习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和盲目的追捧。

辅导班真能提高成绩？其实打的是“心理战”

很多家长都说，孩子上补习班后，成绩明显提高了。事实上真的如此吗？我们关注过不少校外辅导机构，发现目前还没有哪个补习班敢夸口保证提高孩子的成绩。

当然，有些机构会跟家长签承诺书，保证孩子补习一段时间可以提高多少分，但这其实玩的只是一个概率。通常情况下，这种“承诺班”的收费非常高，他们招收学生时会先测试，为孩子的学业水平定位，让家长觉得并非所有人都能进“承诺班”。其实，10个签约的学生里只要有5个达成目标，利润就够这个班运作了。当然，的确有一些学生在机构内部测试中成绩上升了，这不难理解——读过大学的都知道，平时不懈怠，考试前的复习课千万不能逃——这是一个道理。

教育是育人的事业。如果是教育的“产品”，那么我们会发现这个“生产线”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包括课堂教学在内的教育，最后的效果在学生身上体现，而学生又千差万别，导致最后的“成品”质量参差不齐。为啥老师都愿意教好学生？因为好

面大法”“Z字法”“目字法”“金字塔”……这些名字只适合特定的题目。换言之，这样的数学教的不是数学思维，而是套题背题。如果考题灵活一点，稍微变点花样，学生答题的正确率就明显下降了。

还有现在很火的各种针对学科竞赛的提高补习班，说到底就是提前透支学生的学力，四五年级的内容一二年级上，初中的内容四五年级上，高中的内容初中竞赛讲，对学生的摧毁正在于——“笨鸟先飞”。

某著名培训机构的负责人曾有一个口号：“有一个好老师才开一个班”。但，真相却是培训机构几乎都是“有一个班才去找一个老师”。在机构眼中，只要开了班，老师不可能找不到。而找来上课的老师，不少都是非本专业的，有的甚至连基本的教师资格证都没有。有的培训机构，每个老师只上一个板块，老师把这个板块的讲义都背出来，进行机械化教学，这对孩子的思维培养没有任何帮助。

或许有心的家长会问，人家培训机构就是牛，孩子去上课，就是学会了呀。其实，家长扪心自问，到底是培训机构教会了孩子，还是你自己陪读后教会了孩子？如果家长在孩子的培养上能够坚持陪读，那我相信你最后跟娃能一起考上名校做同学……

真正的“牛”老师都在体制内高中和学生斗智斗勇

现在，家长都像打了鸡血一样送孩子去补习，他们或许会说：“我们也很无奈，被逼的”……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并且理解并非人人都去上名校，却都希望上名校的是自家的娃。我遇到过一位快退休的小学语文老师，在一些家长眼中“很赚得动”。我曾疑惑，小学语文有啥好补的？但他的一句话说出了真相：找他补习的孩子这么多，就是因为家长都抱有梦想。

当一个孩子经历了近10年的学校教育到了高中，他的学业是什么水平，家长心中其实都知道，但在小学并不清晰的评价模式下，孩子的潜能也没有被识别，不少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只是还没开始努力”，不愿意接受孩子能力一般的事实。正是这样的心态给本已火爆的校外补习市场添了一把火，很多娃成了烧旺这把火的木柴。

而到初中和高中，不少家长送孩子到外面补习，是因为他们认为培训机构搜罗了一批名师或名校的有丰富经验的教师。名校教师真的非常厉害，他们要和一群学习能力超强的孩子“斗智斗勇”。但真正教学能力强悍的老师，一般都被安排在高年级的学校里，比



培育卓越青少年：生命教育与生涯规划始于幼儿期

近日，关于名牌大学有四成学生是“空心人”的论述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并且引发了人们的担忧。当代年轻人向往追求并拥有“精英光环”，但他们是否也关注自己的内在生命力量。曾经一路名校走过的青少年步入社会后，将会遭遇严峻考验：从受保护的少年进入充满竞争的工作环境，更会面对不能预测的挫折与逆境。青少年要战胜逆境，获得成功并贡献社会，除了专业技术的“生产力”，还需要丰盛的“生命力”。

“生命教育”正是对“生命力”的培育。从发展心理学角度来看，生命教育应该从儿童早期就开始，并且要贯穿中学以及大学生阶段。

缺乏高品质的关系，是青少年心理危机的根源

我们经过一系列研究发现，良好的抗逆力必须要有效能感（我觉得我行），归属感（我有良好的支持系统），乐观感（我对未来充满盼望）。其中，有爱的归属感是核心。

经历十多年的探索，从2007年开始华东师大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开展“青少年成长的天空项目”，目的是找到具有潜在危机的青少年，并培育青少年的抗逆力。

青少年会遭遇很多风险因素，诱使其出现心理危机。目前国内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共有三级干预体系：一级干预就是每一个青少年都必须接受的心理教育，现在中小学都会开设心理健康课程，而且十三五儿童发展规划

己的内心和性情断裂失联，无论外在的表现多么出色，内里也是岌岌可危。

“生命教育与生涯规划”如鹰之两翼推动青少年生命成长

探索了近十年内在生命的培育，我们发现生涯发展（外程）也渐渐成为推动青少年生命成长的重要力量。

生命能量的发挥包括在家庭、职场、社会与国际视野的展现——在家庭具有爱的力量，在职场有生涯规划能力，在社会具有甘心服务的谦卑感，在国际具有全球互学之融合。推动青少年生命成长的两个重要因素就是生命教育和生涯规划。

生命教育更关注的是青少年内在生命的培育，包括个人内在素质的教育。而生涯发展则更多的是青少年的外程。当它融入生命里的时候，自然就会有生产力产生。

发展性生涯规划理论认为从孩子出生就可以进行生涯规划，但是不同阶段探索的内容并不相同。

早期的生涯规划主要是帮助青少年认识自我、认识关系、认识周围。然后，随着年龄的增加，到中学阶段开始探讨青少年的兴趣能力，包括与社会的联系，以及社会需求。

“生命影响生命”是整个青少年生命成长的核心，只有真实建立彼此的关系，才能支撑生命、保护健康、推动成长。而且，真正的关系是建立在内心的“同行与陪伴”。要建立具有抗逆能力的校园环境，老师、家长、青少年必须彼此建立真正的关系。

破解研究生和导师“不咬弦”的“魔咒”

马臻

近年来，各类媒体频繁曝出研究生师生关系“变异”的“丑闻”：导师雇佣研究生为其开办的工厂“干私活”导致学生人身伤害；导师利用手中的权力，不让研究生毕业，被学生实名举报；导师骚扰女研究生，甚至发生不正当关系……需要指出的是，即便这些个案代表着“个别真实”，也不是“总体真实”。现实情况未必那么极端，但师生“不咬弦”的情况时有发生。

“不咬弦”的原因在于诉求不同：读研期间的专业培养，不一定能保证研究生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更何况，很多学生想找的是和本专业无关的、能“挣大钱”的工作。导师只管专业培养，并不关心研究生毕业后能否“挣大钱”。

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研究生吐槽导师整天催做实验、压着学生的论文不发表。而导师也常常苦惱于学生做科研不积极、一旦发表“够毕业”的论文就“不见人影”。至于“导师让学生补做一些实验而学生不愿意做”或者“导师说要把论文投给高档杂志，而学生只想投低档杂志”等日常琐事，更是司空见惯。

研究生和导师本应和睦相处、携手共进，还有什么会破坏这种“理想状态”？归纳起来，师生“不咬弦”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彼此的诉求不同，或者至少有一方的需求得不到满足。

研究生导师的主要工作任务是培养学生、做研究。研究生要毕业，也需要做研究。从事实验科学需要大量资金。这些资金并非由学校“按需分配”，而是来自导师辛苦“挣”来的科研经费。

于是，课题组“运行模式”就成了：导师申请到科研项目，并承担做研究所需的设备费、材料费、测试费、劳务费。研究生通过做项目，得到了学术训练，积累了实验数据，写出科研论文和学位论文，然后毕业。导师则用科研成果来“交账”，并申请新的项目。

在这种国内外通行的“运行模式”下，导师当然希望研究生能认真真地做实验、发文章。这也是研究生能毕业的必要前提。

但研究生也有自己的诉求。研究生毕业后要么找工作，要么继续求学。准备继续深造的学生，当然希望能发表好的论文。而那些准备直接就业的学生，则希望达到毕业要求后，尽早毕业，以便顺利找到工作。

对比两者需求，可以发现，如果学生不认真做科研，想“混毕业”，导师就会不高兴。而如果导师“压着学生的文章不发表”，导致学生达不到毕业的要求或者“不让研究生毕业”，都会引起师生矛盾。

但现在，工作“不好找”。研究生如果在校期间参加了实习，毕业时就有可能进世界“500强”企业；而如果不去实习，只能进普通企业。这样的“现实”摆在面前，“傻子才不为自己考虑”。于是，研究生们就纠结了：为什么导师不让研究生外出实习？教育的目的是，促成人的全面成长，还是让人成为“科研机器”？

“研究生不好好科研，整天想着实习、挣大钱，这样的情况在我读书时没有，在国外我也没见过。做科研本来就是清苦的，想着挣大钱就别来读研究生！”一位老教授感慨地说。

导师们不愿让学生在科研上“混”，还在于自己承受着很大的责任：导师们不但要传授专业技能，还要确保学生的论文达到一定的“厚度”和质量，且无学术不端。而且，一旦学生的学位论文送外审被“枪毙”，导师就要“背黑锅”——被通报批评，甚至被暂停招生。

于是，导师和学生围绕“做实验”“发文章”“毕业”“实习”“找工作”等“关键词”频繁展开“拉锯战”。

那么，准备继续深造，希望发表好论文的学生，为什么也会“不快乐”？原来，一些学生怀着“远大理想”进课题组，本来希望能借助导师在重量级学术刊物发表论文，进而进高校任教。一旦他们没有发表“重量级论文”，或者感到实验条件没那么好、导师的科研点子没那么灵光，就开始怪导师。这也是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表现。

经济压力给师生关系增加新的变数。除了毕业、职业发展，研究生们还有生活需求——他们希望学校和导师提供充足的资助，使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近年来，读研究生已经全面实行交学费。同时，各高校显著地提高了研究生的生活补贴，还以各类奖学金、助学金、退还部分学费等形式给研究生资助。导师也给研究生发放科研补助。但还有很多研究生声称，基于目前的物价水准，“这些钱只够维持基本开销”。

读研需要交学费，学生家长需要给学生提供生活费用，这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但为什么研究生还“哭穷”？为什么读本科时，学生就拿着家长给的钱交学费、维持日常生活，而没有抱怨经济压力太大呢？

一位博士生说：“高中毕业时，刚离开父母，还没有学会独立，心里也没什么负担。而读到博士，自己成熟了，能感受到父母的艰辛，并且这时父母比几年前更老了，我不好意思再向家里要钱。”

这样的想法相当普遍。再加上当初本科毕业就参加工作的同学“活得很滋润”给研究生造成的心理压力。为此，有些学生课余做兼职，甚至把时间浪费在亲朋好友借钱、和银行信贷部门打交道上。这不仅影响学生的生活质量和科研进展，还造成导师的不解和不满。

学生有难以排遣的经济压力，有时会把手头指向导师。有研究生认为，自己是在给导师“打工”，而导师就给“这么一点点工资”，是在“利用廉价劳动力”。针对这样的“指控”，导师有“不被理解的无奈”。

无奈之一，在于“捉襟见肘”。导师给学生发多少钱是有一定的“参考标准”的。并且，科研经费当中能用来发科研补助的部分是有限额的。前几年一个资助额度80万元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只有12万元（即15%）能给研究生发科研补助、交培养费，仅能维持课题组6名研究生一年半的“生计”。

无奈之二，在于被误解成“周扒皮”。一位导师指出：如果导师从企业拉来“横向”项目，让研究生做“小工”，但研究生同时还得做另外一个“管毕业”的基础课题，这是“剥削”或者学生做实验、写文章，但文章发表时只有导师的署名，这也是“剥削”。但现在，导师提供了实验材料费和测试费，并且花了大量时间指导学生，让学生正常毕业。这怎么能叫“剥削”？

师生在困惑和“扳手腕”中浪费了很多时间，这不利于发展健康的师生关系和课题组文化，也不利于维持课题组的“战斗力”。如何化解师生“不咬弦”的“魔咒”？

破解师生之间“不咬弦”的重担，往往落在研究生在校期间的直接负责人——导师身上。

我认为，首先，导师要明确，当考研学生来咨询，就必须把课题组各方面情况如实相告。导师还要强调，将来可以不从事科研业的话，但读研究生就要像读研究生的样子。这样，既能提醒学生，也能吓退那些想混毕业的学生。但问题是，有很多学生考上之前想不清楚这么多，他们“只要能考上，什么都行”。而一旦进校，想法会改变，并且受周围同学影响很大。因此，等他们进校后，导师还需要反复跟他们讲清楚培养计划和要求。

其次，调整自己。有一位博士生分享说：研究生进校时，无论对导师还是对自己，都有设想。但当理想和现实不一致时，研究生要学会调整自己——因为不可能退学，也很难转课题组。同样，导师发现学生和预期不一样（比如不想继续深造，而只求毕业）时，也要调整自己。我带的前两届研究生没有实习也找到了工作，但后来有个研究生提出想利用平时时间外出实习。我当然不愿意，经过讨价还价，我让他们在确保毕业不成问题的前提下，利用研二研三的暑假实习，并保证他们读研三时找工作的时间。

再次，要树威信。我的一位同事初建实验室时，对学生要求很严，有的学生就说这是“魔鬼实验室”。这位同事通过几年努力，带领学生在顶级刊物接二连三发表论文，并获得国家奖学金和各类荣誉称号，现在组内学生心服口服，走进他课题组的学生也络绎不绝，这就形成了良性循环。

最后，鼓励学生“说出来”、“向前看”。我就让学生把心中的顾虑、诉求提出来，我能解决的就帮忙解决。他们也可以找师兄、师姐“诉苦”，找辅导员和研工组长“评理”，但不要把苦闷放在心里。当课题组学生抱怨我管得严时，我还对学生说：“我以前在别的课题组也觉得很有压力，但离开以后就好了。你们要带着自己的目标去，和导师的不愉快只是路边的电线杆。”

而对于学生来说，考研之前也要想清楚：读研究生意味着什么？进这个课题组合适不合适？读研后，要和导师沟通，调整自己，疏导心情，并积极地向“向前看”。更重要的是，要明白：读研究生是进入职场的前站”。进入职场后，当然需要为了实现团队的目标而努力工作，需要敬业精神，需要服从领导的工作安排，并且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和事。既然如此，就要把读研期间的各种经历当成职场锻炼。

（作者为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